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7年第7期（总第277期）

目 录

- 一、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八大趋势
- 二、本科生院是一流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变革的重要方向
- 三、武大探索新模式 本科生学术与科研“不离不弃”

一、21 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八大趋势

21 世纪，世界各国开始全面重新审视博士教育，博士教育在培养理念、规模结构、招生选拔、培养机构、导师队伍、课程结构国际化水平及质量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使博士教育更具适应性和活力。

趋势一：培养理念：从培养学者到培养精英

在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影响下，过往的博士教育一直矢志不渝地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高等学术机构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的“洪堡精神”为各国博士教育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在当前博士教育变革的时代，各国对博士毕业生就业“社会弥散性”的应对却并没有恪守“洪堡精神”，而是普遍通过积极主动地追踪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改革博士培养理念，努力把博士们打造成各行业的精英。

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 2012 年发布的报告《从研究生院到职业生涯之路》指出，不仅是博士教育利益相关者要透过职业生涯信息更全面的了解博士学位的价值，教师也要立足于培养学生全面职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来开发课程。2015 年，该理事会的报告《博士职业路径对学位点改进的意义》进一步显示，美国有 83% 的研究生院每年都会追踪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情况，并且其中 27% 的研究生院都搭建了正式的追踪渠道。

全球的博士教育机构都在努力对博士教育理念进行“再定义”。博士教育的目标已不再单一地培养学者，而是强调通过学习与研究使博士生养成良好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考能力、科学分析问题的能力等，为进入各行各业成为职场精英和行业领袖做好准备。正如 2015 年在牛津大学所召开的第二届博士教育进展国际会议发布的《牛津宣言》所言，“作为新知识、新观点及新方法的创造者，博士学位获得者们卓有智慧、能力非凡且多才多艺，他们能够成功进入宽广的职业生涯，为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关键，必须受到充分认识和广泛宣扬”。

趋势二：规模结构：从单一扩张到结构分化

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韩国、德国和日本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的增长率都超过了100%，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增长率超过了50%，美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虽然“基数”庞大，其增长率也超过了20%。2000年至2014年，尽管德国和日本等博士教育大国的增速明显放缓，但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增长率仍超过100%，美国和英国的增长率也超过了50%。

2000年以后，博士规模扩张明显伴随着博士教育结构的分化。很多国家纷纷在单一学术学位的基础上，不断加大专业型、职业型或授课型研究生培养的力度。英国研究理事会报告《职业博士学位及其对职业发展和工作生涯的贡献》指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哲学博士仍然是英国最主要的博士种类，但此后博士教育开始进入一个不断多样性的阶段，职业博士在应用性场景中成为哲学博士的替代物，并在学术知识和应用知识中保持适度的张力。2008年，美国将原有的学位分类进行了调整，将绝大多数第一专业学位更名为专业实践型博士。按照新的分类标准，2000年到2014年美国职业实践型博士学位授予增幅近两万人，约占博士学位授予数总增长额的1/3。无论公立或私立，大部分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职业实践型博士学位与学术型博士学位授予数旗鼓相当。

中国在2000年前后开始发展博士专业学位，先后设置了临床医学博士（1998年）、兽医博士（1999年）、口腔医学博士（2000年）、教育博士（2008年）和工程博士（2011年）。博士教育结构的分化已现端倪，但这些专业学位博士往往集中于学术力量较强的“985工程”院校和“211工程”院校，所占比例也相对较小，且主要集中于临床医学博士和教育博士。

趋势三：招生选拔：从评估学习到全面考察

最近几年，单纯评估学习的做法开始受到质疑。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2015年发布的报告《研究生招录中的全面审核》指出，当前院校过分强调量化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本科学分绩点和标准化测验，这会让那些年纪较大、少数族裔等特殊的学生群体在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GRE只在

预测研究生第一年的学习成果有效，随着时间推移，GRE 的有效性在不断下降。另外，很多学者的研究显示，非认知变量，包括情商、自我效能、责任心、创造力、兴趣、态度等，对申请者在研究生阶段取得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当研究生步入职场，非认知变量为研究生所带来的收入回报是显著超过认知变量的。因此，如何考查申请者非认知能力的水平逐渐成为研究生教育招生改革的重点。美国 ETS 自 2000 年以来就开始探索非认知变量的测量，其研发人员提出了四种的方式，包括自我评价、相关者评价、对照组测试及传记数据，其中个人潜力指数就是这些方式的综合运用。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也在其发布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准则》中明确提出，应通过多方途径充分寻找学术和非学术的证据，从而挑选与培养项目最适合的研究生。中国高校博士的招考也逐步从着重考查专业能力的笔试、复试走向全面评估的申请审核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武汉大学所实施的申请审核制更加注重考查申请者的综合素质和学术潜力。

趋势四：培养机构：从一方主导到多方协同

为了提高博士培养质量、适应社会需求，汇聚培养合力、协同培养博士生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不仅表现在跨学科培养、校际联合培养，企业、科研机构也参与到协同培养研究生的过程，校企、校所等新的联合培养形式应运而生。

例如，在美国，校际间的跨校选课、学分互认已成为研究生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英国，由考文垂大学、林肯大学等 13 所大学联合搭建了博士培养联盟。在欧洲，伴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区域层面的学分、学位互认制度逐渐完善，博士生可在签订了协议的各校修读学分并实现互认。同时，校企合作已成为较为普遍的培养模式。

另外，跨学科培养研究生也是当前多方协同的重要形式。最近十余年，在欧洲逐步建立的博士生院就广泛采用了联合项目和独立项目的形式，如德国洪堡大学建立的古代研究博士生院、社会科学博士生院以及比利时根特大

学的工程博士生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博士生院等。近年来在加拿大出现的学生自主设计项目，要求学生在一个母院系注册，并自主选择两位及以上来自不同学科的导师对其进行学术指导，如法律、医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音乐、心理学和电气工程的交叉领域等，以便从最不可能联系的事物中寻找可能存在的联系。

趋势五：导师队伍：从独立培养到团队指导

比较而言，博士生指导的集体责任制让博士生能得到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专长的教师的指导，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在经验丰富的导师带领下，也为年轻导师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因此，采用单一导师制的国家已经着手进行改革。

21 世纪开始，德国的结构化博士生培养进入了一个全面扩散的新阶段，结构化项目不断增多，组织形式更加多元化、国际化和网络化。与师徒制博士生培养模式相比，结构化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减少了对于单一的“学生—导师”二元关系的依赖，用一整套组织框架和制度设计将博士生培养作为一个完整程序从大学的学术活动中独立出来。为了进一步推进博士生的团队指导，欧美高校开始构建导师网，将各方面可能产生指导行为的教师和研究生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形成及时畅通的指导机制。例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发布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准则》特别提到，导师团队由一位主导师进行负责和统筹，另可纳入专业领域的其他导师或研究人员、学院和系所的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同时，导师网中的导师可不局限于校内，也可以来自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学术机构。学生接受校内导师指导的同时，也接受校外导师 8 个月的指导。此外，导师网中的导师还可纳入高年级博士生作为同伴导师，为新生分享其学习生活经验、为新生适应博士生生活环境提供建议和答疑解惑，并对新生与其学位点项目是否适合提供建议。当博士生进入学位论文的写作阶段后，由 3~7 人的论文指导委员会来联合指导，其职责包括监督学生的年度学习进展、组织博士生综合考试和论文开题、指导博士论文写作、

为博士论文成稿提出修改意见、对论文是否通过答辩进行投票等。

趋势六：课程结构：从专业主导到通专结合

近年来，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以增设系统的通用型课程为重点的课程改革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通用型课程旨在培养博士生的可迁移能力（或称软技能），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在《从研究生院到职业生涯之路》报告中指出，近年来为满足非学术劳动力市场对博士毕业生的需求，众多高校开设了培养可迁移能力的课程，以期缩小院校培养的质量规格和企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质量规格之间的差异。总体而言，尽管通用型课程的名称会因校而异，但均侧重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口头和书面交际能力、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心等方面的训练。

中国研究生培养素来注重课程体系的建设，2014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指出，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符合培养需要的课程体系，中国研究生课程将突破专业（二级学科）的限制，将课程的精深和广博融合，按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和设置跨学科课程，增加研究方法类、研讨类和实践类等课程。

趋势七：国际化：从经济主导到全面行动

20世纪50年代，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数中留学生比重还始终控制在10%以内，70年代开始，留学生成为美国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主要来源，20世纪末，美国博士学位授予中持有长期签证和短期签证留学生的比例已经超过30%。2014年，英国和法国在学博士生中留学生比例超过40%，澳大利亚为33%，日本趋近20%。

传统上，经济资助是推进学生流动的主要驱动力。21世纪以来，各国在推动博士教育国际化进程时已逐渐超越了“经济手段”的单一模式，呈现出更加全面系统的特征，如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教育制度的国际化及培养的国

际化等。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面向 2030》，近年来跨国性的科研合作往往以全球问题的解决为切入点，就生命科学、粮食、水及能源领域开展研究。这些科研合作不仅支撑了特定领域博士生的培养，也为各国联合培养博士生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显示，包括美、英、德、法和澳等 35 个成员国以及中、俄、南非等部分非成员国的学制已可清晰地实现跨国的比较和对应。与欧洲采取的国家层面甚至超国家层面的国际化策略不同，在美国博士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研究生院扮演了更加主动的角色。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在 2008 年年底的调查显示，81%的大学研究生院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扩大留学生招生，超过 54%的研究生院正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展开合作以扩大留学生招生，31%的研究生院表示已经增加了资金投入招收海外留学生。中国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联合培养项目也在不断增多，2014 年硕士及硕士层次以上的合作办学机构达到 22 个，办学项目达到 194 个。

趋势八：质量保障：从导师主导到多方参与

传统上，导师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把关者和“看门人”，教师只通过保证授课质量来承担博士培养的有限责任，学校和院系只负责导师遴选以及从招生到答辩的程序性工作，博士培养质量保障主要依靠导师的自觉。

最近十余年，按照欧洲大学协会的观点，博士教育的质量保障开始由宿命型文化和专家型文化转向管理型文化或整合型文化，突出强调管理人员、教师及相关利益主体都更大程度地参与培养质量保障的全过程。

质量文化的转变，首先体现在院校职能的加强。欧洲大学近年来增设的研究生院或博士生院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依据欧洲大学协会 2013 年的调查，80%以上的欧洲大学都拥有博士生院。英国研究生院理事会 2015 年调查也显示，71%的英国大学已建立研究生院或博士生院，其重要职责包括制定一个明细的管理框架、制定博士培养的基准质量、强化导师的角色意识、促进招生入学的透明化和规范化等。

其次，质量文化的转变也体现在第三方组织（包括专业协会）的介入。一些组织会聚焦博士生培养的支撑条件与学位论文，对质量进行监控。例如，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所开展的科研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对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研究生奖助学金、研究收入及研究环境与声望五项指标对各校不同学科的科研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将作为科研质量拨款的依据。

中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承担着中国高校的学科评估，既通过考查科研队伍水平、科研经费、科研产出与获奖以及学生培养成就等方面对参评学科质量进行评判，也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盲评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监督。另一些组织会关注博士生培养过程，开展以“学”为中心的过程性、增值性评价，对培养质量进行诊断。过程性评价主要采用每年或隔年举行的结构化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数据积累和分析，为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提供方向。

作者：王传毅，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赵世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摘自：《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原题为“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八大趋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5月4日

二、本科生院是一流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变革的重要方向

北京大学的改革进路及评价

在2000年设立通识课程类别之后，北京大学于2001年开始元培计划的探索，2007年成立元培学院。在改革和研究过程中，北大逐步认识到元培学院是一所住宿学院，或者说书院，这个书院有学生学籍，因而学生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但学籍一直属于元培学院。学生毕业也是元培学院的直接校友。北京大学在元培学院小规模探索的同时，于2002年开始大类招生和培养工作，也就是将一个学院的专业合在一次招生，学生在之后

的学习进程中在学院内部相对自由的选择专业。2007年元培学院成立后，在逐步转变为住宿学院同时元培开始了跨学科专业建设，率先建成“古生物”专业、“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专业、“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等，因而将住宿学院在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的潜力初步展示出来。

2015年2月林建华校长返回北大后，经过反复权衡和研讨，最终选择的改革路径不是扩大元培模式规模，而是尝试放开学部内本科生任意选择专业。2017年5月将开始的转专业规则如下：（1）学生提交申请。拟申请转院（系）转专业的学生需在“北京大学学生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学生业务中填写相关申请表并打印，在院系规定时间内交到拟转入院系，参加转入院系组织的转专业审核和考查。（2）接收院系组织审核或考查。接收院系需成立转院（系）转专业工作小组，依据已公布的学术要求，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审核或考查，并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

相比之前的转专业规则，以上制度的核心特色为：第一，理论上没有了转专业名额限制；第二，学生申请转专业不需要转出院系批准，这从学生入学角度淡化或者彻底去除了学生的院系身份归属和束缚，这一点与本科生院的本质相接近。以上制度实行后，也可能出现极端情况。例如，某个院系开学就没有二年级学生了，或者剩下的学生成绩都不佳。当然，管理者为了过渡平稳，2017年春季接收院系的转专业名额可能不会太多。

但从学生发展角度看，北大方案仍然存在三方面逻辑缺陷，从而意味着进步的有限性。

一是一个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如果想学化学专业或者地质专业，阿拉伯语的老师无法给该生提供咨询和帮助，也不愿意提供帮助。

二是改革期待调动院系的积极性把一年级课程上好，这是积极一面。但地质系把专业课程上好了，也对学生过分热情，但地质系本身的课程无法启发一个学生（也许是历史学家）新的可能，或者反而因地质课程极好而耽误了学生。

三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课，但外语学院自身的教师难以指导学生在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更广泛知识领域中的课程选择。

本科生院的四种优势

通识教育的一个英文对应词为 General Education，另外一个英文对应词为 Liberal Education，直观翻译就是“解放教育”及“自由教育”。这一点意味着通识教育会帮助学生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自由。学生被什么束缚？束缚当然很多，如学生可能被流俗所束缚、被高考的失败所束缚、被金钱所束缚、被权威所束缚、被经典文本所束缚、被范式所束缚而使范式成为范式陷阱等。从某种角度看，在高考时就选定了专业的学生会被某专业身份所束缚，被其所在院系的专业教学计划所束缚。实践中，这是大学“有形的身体”对学生最大的束缚。例如，北京大学天文系不允许学生转专业，在 2013 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调查中，一位同学回忆说，天文系一位老师曾清楚地对他们说：“你进了天文系，我们就要按照天文系的模子让你毕业，至于你将来做什么，我们不管”。这一点成为该学生对天文系并不美好的教育回忆。

什么样的有形身体或者说教育组织模式是一流本科教育的组织模式呢？从知识论基础上看，就是能够去除学生专业身份束缚的本科生院。当前，中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建立了本科生院，但如果本科生院仅仅只是为方便本科生教学管理而比照研究生院建立的、以“教务处”等行政机关为主的机关升级，那么这样的组织机构变革与本科生院的本质尚有一定不同，意味着未来需要深入变革。

本科生院的本质在于，学生的学籍不再属于学术性系科，而完全属于本科生院以及本科生院之下更小的住宿学院或者书院，学生的学号中不再含有院系和专业特征。这样的“身体”使得学生在专业选择和知识建构方面重新获得了本来就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学习自由”，与苏联专业式教育组织模式相比，本科生院与通识教育的本质相结合，一般会呈现以下四点优越性。

第一，进入本科生院的学生尚未确定专业，其在一年级（有时延续到二年级）通识教育基础上再选择专业，理论上会选择自己更喜欢、更擅长的专业。学生能够学习更喜欢和更擅长的专业，学习效率会提高。由于学生尚未确定专业，教师和学术性系科必须投入更大力量去争取生源，这有助于提升教师教育投入和教育质量。西安交通大学在“本科生院的核心使命和宗旨”中提到的“倒逼学科和专业、倒逼老师”正是此意。本科生院的组织模式使得转专业的学籍管理概念从本质上消解，学生只是在选择专业、宣布自己的专业（Declare Major）。

第二，促进通识学习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知识基础，通识教育必须经由通识学习才能发挥作用。所谓通识学习，就是学生敞开心灵，对“专业知识”外更广泛知识视野和“无用”知识的倾心关注和学习。制约通识学习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专业主义。如果学生刚一进入大学就有专业身份，比如一名学生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学生，你让他学习“欧洲文艺复兴”或者“政治哲学”课程，他会问你，“我学这门课程有什么用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此，本科生院在大学一年级适当“空”去学生的专业身份、使学生不确定其专业，本质上会促进通识学习。目前，许多高校的通识教育实践聚焦于提升通识教育课程品质，开出完美的通识课程，但“有形身体”改造与完美的通识课程同样重要。

第三，发展跨学科专业，促成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在美国同样实行本科生院制度的华盛顿大学，本科包含大量跨学科专业，例如“整合社会科学”“法律、社会和公正”等。其中一个跨学科专业为“应用与计算数学科学”，下分八个专业方向，包括“生物和生命科学”方向、“工程和物理科学”方向、“数学经济学”方向、“社会与行为科学”方向等。从专业、专业方向的名称看，这些专业的知识都跨越了传统知识的疆界。学生如果身份固定在一个传统的本科专业和院系，这样的跨学科专业学习将非常困难。最近教育部提出了“新工科”概念，其实许多新工科专业本质上都是跨学科专业。例如斯坦

福大学的几个新工科专业名字中就呈现了“+”，例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音乐”。没有本科生院的组织模式，以上跨学科本科专业难以实现和良好运行。

最后，本科生院与住宿学院的矩阵式结构可以促进大学内分工水平，使得纵向学术性系科摆脱了学生管理工作，专心于知识传授和知识创新；使横向住宿学院专注于学生课外教育与辅导，作为小型组织不再承担知识创新责任。专业分工的强化使大学对不同组织的考评标准宜于制定和执行，从而能在管理上提高横向和纵向组织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例如，在学生因为抑郁而出现学习和生活问题时，不需要教师和科学家参与（不专业地）处理，而住宿学院的学生工作专家和专业心理咨询者更加擅长处理以上问题，院系科学家不需要出面，因而使得科学家有了更多专心推进技术创新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大家很少注意到的潜在组织优势，这种管理优势的潜力十分巨大。

2008年7月15日，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成立。2016年12月24日，我国有一所顶尖高校——西安交通大学也成立了本科生院，在本科教育组织模式方面也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改革步伐。与浙江大学有所不同，西安交通大学在此之前已经依托宿舍成立了彭康、文治、启德等八所住宿书院。经过长时间运行，学生逐渐建立起对住宿书院的归属感。住宿书院成为学生在学术性系科之外的身份家园。以上本科生院和住宿书院的教育组织模式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高校教育组织模式非常相似。牛津、剑桥的住宿学院模式是向中世纪巴黎大学学习的结果，因此，本科生院和住宿学院制度是向古老大学组织模式的一种复归。

本科生院之下是否建设住宿学院值得探讨。如果高校并没有要求学生集体长期住宿，那么住宿学院实际并不是必须的。国内高校大都要求学生集体住宿，因此在本科生院之下依托宿舍建设住宿学院（书院）具备条件，在这一方面汕头大学、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等均有探索。

作者：卢晓东，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摘自《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4期

三、武大探索新模式 本科生学术与科研“不离不弃”

本科生学术与科研如何“不离不弃”

本科生究竟如何做好科研？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越来越回答不了这一问题。

为了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让有科研兴趣的本科生接受正规训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实践出一套系统工程：丰富“课堂”概念，拓展课堂外延，探索“立体化”教学模式——在第一课堂之外，以自由而有组织的形式，实现师生间双向互动，探索科研素养涵育新道路。

论文工作坊：“吃透”顶级论文打下基本功

周四上午9点，学生李浩然打开电脑播放幻灯片，进行论文讲解——一篇发表在近期《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

李浩然介绍，为了完成一篇论文讲解，需要花大量时间阅读文章，仔细推敲文章内容，逐条查阅文章参考文献，并用作者的数据复盘计量过程，以便真正读懂文章。“只有将分享的文章吃透，才能抵挡老师和学生枪林弹雨般的提问。”

这种认真的风气正是“增长与发展 workshop（论文工坊）”所倡导的。工坊发起者和主办者、经济系副教授罗知是一名青年学者。她认为，做好科研的关键在于积累，而积累的第一步是理解前人的文献。

为了解决大多数学生在科研选题、论文写作方面的普遍问题，2009年，罗知创建了论文工坊，将学术培训拉出课堂，以交流沟通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文献分析能力，以期为学生打下科研基本功。

工坊每周四上午举行，只专注一件事：学习国外顶级期刊的最新论文，每期2篇。通过学生讲解论文、师生共同评析的方式，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提高学生的自主科研能力，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在论文分享过程中，不懂或有疑问之处可打断讨论。若遇到老师也不熟悉的知识，便约定改日进行深入探讨。老师会引导学生谈论主题论文的优缺

点，启发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选题进行思考。

例如，在一篇研究“美国未婚少女妈妈电视节目对于未婚生育率的影响”的论文报告结束后，师生进行了衍生讨论：中国是否有类似的电视节目，是否影响了个人的行为模式，是否可以找到媒体或网络数据进行研究……经过这种发散性讨论，学生找到了研究课题和方法。

李浩然近来参加了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办的经济学青年联谊会，他说：“如果没有论文工坊的锻炼，很难想象我能在完全陌生的平台，面对来自各高校的优秀师生作学术报告。现在我做到了，于我而言，这是一个飞跃。”

8年前，论文工坊仅由经济系的几名老师和近10名学生组成。如今通过口口相传，其他院系的老师慕名加入，队伍不断壮大。工坊的形式也在不断改变，现已不仅限于讲解顶级期刊的论文，还能讲解自己发表的论文。自2015年起，论文讲解和答辩变成了全英文。

正如罗知所说，“除了学习文献之外，参加论文工坊的好处至少还有两个：一是督促学生做好PPT，二是学会演讲。这两点也是学生以后走向工作岗位也必不可少的能力。”

科研训练营：知名教授传授科研经验

本科生常为做科研写论文缺乏创新、独特的专业见解而苦恼，渴望得到高人的指点。

学院从这一实际出发，自2012年起，每年暑期举行科研训练营，邀请包括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珞珈特聘教授等在内的学者，与本科生营员面对面交流。

20多年前写本科毕业论文时，为了看懂翻译文献学习俄文；指正卢卡斯模型猜测的错误、高分考取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项目；与王平和邹恒甫的合作经历……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的院长谢丹阳教授是学生心目中的学术大神，他以自己发表14篇论文的过程为线索，娓娓道来自己本科以来的科研生

活。

“讲这些故事，是希望你们体会到做科研需要原创，要有闯劲；研究工作辛苦，且成效缓慢，要耐得住寂寞；论文发表前可能会一轮轮修改，要承受得住压力。”谢丹阳在报告最后总结道。

“谢院长提到一个细节：他平时爱储存两道题在脑海中，陪太太买菜时就两眼盯着天花板。太太菜买完了，他的题也解完了，非常快乐。这说明在科研中善于利用时间进行连续思考的重要性。”营员唐庆劼说，科研训练营令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这些见微知著的习惯和方法。

何师元的科研论文“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统计评价”，获得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何师元就是科研训练营走出来的优秀学生代表之一，他坦言，是训练营中主题各有侧重的系列学术讲座，激发了他对科研的兴趣并获益匪浅。

实际上，科研训练营年年如期开设，但主题每年不同。它针对科研立项中学生的实际问题，以增进学生对科研立项的了解、学习交流优秀科研经验为目的，实现了师生交流路径的创新、教学模式的“立体化”。训练营围绕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为本科生提供研究方向的指引，开发学员的创新思维和与众不同的思考视角，从而帮助学生做好科研。

学术导师制：从大一到大四的悉心指导

“本科学术导师制”，顾名思义，即给本科生安排学术导师，给予学习及科研上的帮助。

这是一种将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嫁接到本科生教育的创新制度，是对小班教育教学方式的延伸，是对高素质、复合型理论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经济学基地班学生，从大一进校起，每人配备学术导师。这项制度自1999年实施至今。

学术导师大多是经济学系的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掌握大量的学术资源。大部分学术导师有海外留学背景，

有利于为学生建立广阔的国际视野。学术导师还会邀请学生加入自己的研究团队，带领学生外出调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作为学术导师，最重要的是与学生沟通和交流。导师制是从国外引进的。在国外，导师就像学生的亲人。我很愿意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及生活能力，让学生有一种归属感，在本科期间愉快地成长。”经济学系主任文建东教授谈到对导师制的理解时说。

班上的每位学术导师都十分了解自己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得到充分成长。得益于这一制度，班上也涌现出不少学术之星。

以“美女学霸”石珂为例，她获得美国数学建模大赛（MCM）二等奖，拿到包括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等7所著名海外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由石珂和其好友陈星宇成立的13人图书馆小分队，一共申请到40多个国内外著名高校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就读机会，被称为“武大学霸小分队”。他们只要没课，基本都在图书馆学习，从8点持续到21点。

在学术导师的引导和督促下，经济学基地班的学术氛围浓郁，很能体现研究型培养特色。“学术导师单独对学生进行论文辅导，有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已经发表了10多篇论文。”本科生申雨绮介绍。本科生胡盾炜则认为，学术导师能帮助低年级学生认识和掌握经济学理论，更早步入科学研究领域，找到学术归属感。

可以说，学术导师制度真正体现了“教”与“学”的结合，充分展示了现代经济学的精英教育特点。

拓展课堂外延，注重能力的培养。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下，武大经管院老师给了学生最真诚和实际的帮助，使他们能走出课本的理论框架，最终走向深远的研究道路。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5月15日